

現當代文學叢刊

女性·啓蒙·革命

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

蘇敏逸 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女性·啓蒙·革命

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

蘇敏逸 著

臺灣 學生書局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女性·啓蒙·革命

——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

蘇敏逸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2012.04
面：公分

ISBN 978-957-15-1525-0 (平裝)

1. 丁玲 2. 中國當代文學 3. 女性文學 4. 文學評論

820.908

100009413

女性·啓蒙·革命

——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

著 作 者：蘇 敏 逸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人：楊 雲 龍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七十五巷十一號
郵 政 劃 撥 帳 號：00024668
電 話：(02)23928185
傳 真：(02)23928105
E-mail: student.book@msa.hinet.net
http://www.studentbook.com.tw

本 書 局 登 記 證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捌壹號

印 刷 所：長 欣 印 刷 企 業 社
新 北 市 中 和 區 永 和 路 三 六 三 巷 四 二 號
電 話：(02)22268853

定價：新臺幣三五〇元

西 元 二 〇 一 二 年 四 月 初 版

82036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ISBN 978-957-15-1525-0 (平裝)

本書為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女性・啓蒙・革命
——丁玲的文學道路及其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對
應關係」（NSC99-2410-H-006-106）研究成果。

女性 · 啓蒙 · 革命

——丁玲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

目 次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二章 出走的娜拉： 廬隱、馮沅君、丁玲作品中的情感書寫、 啓蒙困境及其對女性處境的思考進程	15
一、前言	15
二、廬隱：在新、舊家庭／時代間進退兩難	18
三、馮沅君：在愛情與親情之間尋求和諧	31
四、丁玲：對「五四」情感書寫的繼承與超越	40
五、結語	57

第三章 從啟蒙走向革命：

論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初期

胡也頻與丁玲的小說創作 59

一、前言 59

二、書寫社會底層的苦難

——胡也頻二〇年代中期的文學作品 61

三、追尋女性個人的生命意義和出路

——丁玲創作初期的文學作品 75

四、文學道路的轉折——胡也頻與丁玲

二〇年代末期有關革命與戀愛的小說 92

五、結語 103

第四章 「亭子間」與「十字街頭」：

蔣光慈、丁玲「革命+戀愛」小說之比較 107

一、前言 107

二、「革命」作為表現自我的方法

——蔣光慈的「革命+戀愛」小說 113

三、「革命」作為人生可能的出路

——丁玲的「革命+戀愛」小說 135

四、結語 151

第五章 個人與集體、啟蒙與革命的消長、衝突和磨合：

丁玲三、四〇年代的創作 153

一、前言	153
二、從情感與理智的衝突中誕生的無產階級革命小說	158
三、文學與革命事業的結合 ——丁玲抗戰時期的作品之一	169
四、個人與革命集體的衝突與磨合 ——丁玲抗戰時期的作品之二	180
五、結語	194
第六章 歷史的轉折： 丁玲、周立波的「土改小說」 及其文學史意義	197
一、前言	197
二、土地改革運動的「整體性」書寫 ——丁玲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	202
三、政治儀式的「象徵性」書寫 ——周立波的《暴風驟雨》	213
四、結語	227
第七章 餘 論	231
參考書目	245

第一章 緒論

丁玲（1904-1986）可以說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最具有時代感和時代意義的女作家。從二〇年代中後期開始創作，一直到四〇年代中共建國之前，丁玲完成了個人的文學發展歷程，而她的文學發展歷程又與整個中國現代史及現代文學發展史密切的結合。從她的小說創作可以發現，她敏銳地感受著時代的變化，感受著時代變化對她的生命帶來的衝擊和影響，因此其作品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端，扣合著時代的關懷和思想主題。但同時她又不會因時代的潮流而迷失自己，她在不斷變動的歷史中清醒、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同時也企圖在變動的時代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她既投入社會，又期待自己能在社會中保有自我的個性，這就使她在個人與社會、文學與政治（革命）、知識分子與群眾、情感與理智等種種問題中感受到矛盾、衝突的痛苦，又在痛苦中企圖平衡、調和這種種衝突。她的文學歷程可以說是一條個人與外在社會不斷辯證的發展過程。

正因為丁玲同時關注個人自我與集體社會革命，導致長久以來左、右兩派的評論家對她作品的評價往往是正好相反的，而評價的分界點都是 1931 年創作的〈水〉。舉兩個最鮮明的例子，丁玲一輩子的好友、在三〇年代曾擔任左聯黨團書記、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馮雪峰認為丁玲早期的小說反映她「在思想上領有著壞

的傾向」，那是「個人主義的無政府性加流浪漢的知識階級性加資產階級頹廢的和享樂而成的混合物。」^❶她筆下的女性之所以苦悶、空虛、頹廢、絕望，正是因為這些女主人公「在主觀上是和當時的革命的社會力隔閡的」，因此她們不可能「跑到前進的社會中去，使自己得到生命的光和力」。她們只有「和青年的革命力量去接近，並從而追求真正的時代前進的熱情和力量」，才有可能根本地解決啟蒙後的精神危機。^❷而丁玲三〇年代的〈水〉雖然因生活和鬥爭經驗不夠深廣，在創作上有些「公式化」的缺點，但從丁玲小說的發展來看，〈水〉代表著丁玲創作的重大突破：「她的那種向人民的嚮往，當作作家的一種前進的傾向看是正確的，她的熱情也是誠懇的。……所以〈水〉依然是作者發展上的一個標誌，同時也是我們新文藝發展上的一個小小的標誌。」^❸在〈水〉之後，丁玲經過艱苦的鬥爭和改造過程，在四〇年代的作品中補足了三〇年代作品的缺憾，達到藝術上的成就。

與此相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重量級的學者之一、自由主義者夏志清則以「忠於自己的作家」和「狂熱的宣傳家」來區分丁玲早期與三〇年代以後作品的差異。他認為丁玲早期的作品「大膽地以女性觀點及自傳的手法來探索生命的意義」，「流露著一個生活在

❶ 何丹仁（馮雪峰）：〈關於新的小說的誕生——評丁玲的《水》〉，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頁248。

❷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後記〉，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294-295。

❸ 馮雪峰：〈從《夢珂》到《夜》——《丁玲文集》後記〉，袁良駿編：《丁玲研究資料》，頁297。

罪惡都市中的熱情女郎的性苦悶與無可奈何的煩躁」，把作家個人「怨憤和絕望的情緒都發洩出來」。^④而自 1931 年開始創作無產階級革命小說後，作品就喪失了二〇年代「微帶虛無主義色彩的坦誠態度，剩下來的，只是宣傳上的濫調」^⑤，並在此基礎上嚴厲地批評丁玲三〇年代描寫群眾的作品〈水〉和四〇年代的土改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⑥

從馮雪峰和夏志清的評論即可看出，像丁玲這樣一位不斷以文學寫作的方式向內書寫個人困境，同時又向外參與社會實踐，個性與政治立場都極其鮮明的作家，對她的評論很容易受到時代與政治意識形態的侷限和影響。從現有的研究成果便大致可見其端倪。在研究丁玲文學發展的專著中，台灣最著名的是周芬娜在 1980 年出版的《丁玲與中共文學》^⑦。本書也以 1931 年作為丁玲創作的分界，論析早期的丁玲是個「浪漫的自由主義者」，而後期的丁玲是個「搖擺的共產主義者」。此書出版甚早，加上冷戰結構下政治意識形態造成的差異和限制，周芬娜對於丁玲的討論不夠客觀、平靜、周詳，但本書仍有其文獻史料價值，透過本書的評論可以反過來觀察台灣戒嚴時期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以降的文學傳統的詮釋方式。而在大陸出版的研究專著中，丁玲的研究高峰則出現於八〇年

④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 年 11 月 15 日），頁 280。

⑤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284。

⑥ 夏志清對〈水〉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批評，分別見於《中國現代小說史》頁 284-288 及頁 482-488。

⑦ 周芬娜：《丁玲與中共文學》（台北：成文出版社，1980 年 7 月）。

代丁玲在政治上獲得平反後，至九〇年代中期以前，包括王中忱、尚俠合著，出版於 1982 年的《丁玲生活與文學的道路》^⑧；同為 1990 年出版，袁良駿的《丁玲研究五十年》^⑨和許華斌的《丁玲小說研究》^⑩等，在這波丁玲研究的高峰期間，廈門大學翻譯、出版了美國丁玲研究的重要學者、五四時期「學衡派」代表人物梅光迪的女兒梅儀慈教授的《丁玲的小說》^⑪，這幾本專著對於丁玲的生命經歷與各個階段的文學作品進行完整、深入的分析 and 評論，但對於丁玲思想上矛盾、衝突與磨合的辯證關係缺乏較細膩的解讀，在深度上尚有挖掘的空間。九〇年代中期之後，丁玲的研究較多以單篇論文就個別問題加以討論的方式呈現，直到 2005 年張永泉出版了《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⑫，此書以「個性主義」貫穿丁玲的創作，從丁玲自稱「我便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⑬出發，強調丁玲對五四精神的繼承，對個人自由與解放的執著追求和艱難執守，終而導致中共建國後個人的政治災難。而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政治壓迫下，丁玲鮮明而獨特的「個性主義」也開始鬆動，使得她晚年的精神和作品都陷入了「走不出的怪圈」，在新時期的文壇氣

⑧ 王中忱、尚俠：《丁玲生活與文學的道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 年 9 月）。

⑨ 袁良駿：《丁玲研究五十年》（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 年 3 月）。

⑩ 許華斌：《丁玲小說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0 年 12 月）。

⑪ [美] 梅儀慈：《丁玲的小說》（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2 年）。

⑫ 張永泉：《個性主義的悲劇——解讀丁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 年 3 月）。

⑬ 丁玲：〈我便是吃魯迅的奶長大的〉，《丁玲全集》第八卷（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12 月），頁 204-206。

氛下顯得「保守」、「正統」又「太左」。此書對丁玲的研究集中在二〇年代末期「莎菲」系列小說、四〇年代作品與作家晚年精神的討論，偏重丁玲性格與創作中所呈現出來的「個性主義」，而對丁玲參與革命和政治的態度著墨較少，因此論述突顯了丁玲個人與外在社會、歷史的衝撞，較少觸及丁玲內在精神的戰爭——個人個性與革命信仰之間掙扎、搏鬥的關係。

平心而論，個人認為丁玲從二〇年代末期到中共建國前的創作內涵及發展基本上可以以「女性」、「啟蒙」、「革命」等三個元素來概括，這三個元素的內涵在不同時期略有調整，又時時相互牽制、拉扯、影響，在丁玲創作的每個階段各有偏重。丁玲在 1927 年步入文壇，創作最初期的作品看似聚焦在「女性」與五四「啟蒙」的議題上，但此時的「啟蒙」又具有「文化改造」和「思想革命」的意味，她一方面展現五四新文化運動啟蒙後的女性知識分子的生命困境，透過對女性生命困境的描寫呈現啟蒙思想與現實社會的脫節，一方面更執著地探求女性自我實現和參與社會的方法，企圖追尋「新女性」真正獨立自主的生命之路。對她來說，「啟蒙」所帶來的個人解放是要讓女性在獲得獨立思考、判斷的主體性後能自主地選擇自己的生命道路，更能積極地加入由男性所主宰的社會和體制，如此才有可能從根本改變女性與社會的關係。儘管她創作最初期的關懷聚焦在「女性」和「啟蒙」這兩個元素上，但也可以看到她之後走向社會「革命」的潛在性格。當她在二〇年代末期來到上海之後，受到上海革命文學風潮的影響，「革命」的意涵也將追尋「新女性」獨立自主之路的思想、文化革命，與外在的社會集體革命結合起來，在參與社會革命的過程中，實踐、彰顯女性可能

的生命意義和社會功能。此後，在丁玲的文學作品中，「啟蒙」有時意味著個性的張揚和精神的獨立自主，有時意味著以「革命」的概念反省知識分子內在的精神弱點，同時喚醒蒙昧的群眾；而「革命」則同時意味著為小我個人的生命困境和社會集體、民族國家艱難複雜的歷史處境尋求出路。可以說丁玲的文學是以「女性」作為主體，思考「啟蒙」與「革命」所涉及有關個人與集體、知識分子與群眾、文學與政治、意識形態與社會實踐、建構民族國家與歷史進程等問題之間複雜的關係。因此，本論文將以丁玲從二〇年代到四〇年代的文學發展為主軸，論述「女性」、「啟蒙」、「革命」這三個元素在不同時期此消彼長、交互更迭所組成的多重變奏。

另一方面，由於丁玲作品的關懷主題及發展歷程與中國現代文學史有諸多相互對應之處，因此在縱向論述丁玲文學發展歷程的同時，更將丁玲的作品放置在整個中國現代文學發展的脈絡來觀察，橫向地比較丁玲創作與同時期其他作家同類題材的差異，透過差異來凸顯丁玲如何在文學發展的主潮中展現個人創作精神內涵的獨特性，以及其文學發展脈絡與中國現代文學的對應關係。丁玲最初期的創作主要思考五四啟蒙運動影響下的女性問題，因此將丁玲與五四女性前輩作家廬隱、馮沅君等人相互比較，說明丁玲對五四女作家的繼承與超越；在二〇年代末至三〇年代初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歷程中，將丁玲與文學伴侶胡也頻相互比較，論析性別差異如何影響兩人面對「啟蒙」與「革命」問題的看法和視角；在「革命+戀愛」主題的小說中，則將其與開創此一主題的小說家蔣光慈加以比較，說明在性別、學養與思想背景等方面都不同的兩人在書寫此議題時態度上的差異；在四〇年代末期有關土地改革運動主題

的小說中，將丁玲與周立波加以比較，透過他們的作品所展現的文學史意義，來說明歷史轉折對文學產生的影響。

在縱向論析丁玲文學道路的開展和橫向比較丁玲與其他作家的差異時，值得進一步觀察和探究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國家、社會的互動關係。本人在博士論文《「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一書中曾透過對魯迅、胡適與周作人等人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論述，來強調中國的個人主義與西方個人主義內涵在本質上的差異。由於中國高度的人口密度、傳統社會重視人際關係的生活樣貌，以及晚清到五四時期以來憂患的歷史現實等各種複雜因素，使得中國知識分子對於個人主義的主張從來沒有脫離其與整體「社會」、「國家」和「民族」問題的思考。五四時期的個人主義雖然強調「個性解放」的精神，但包括魯迅、陳獨秀、胡適、周作人等人更在乎的其實是「個性解放」之後能對改造文化、思想、社會，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產生正面的影響。¹⁴因此，中國現代小說家對於長篇小說的架構基本上聚焦在思考現代民族國家之建立及其相關的社會問題等「整體性」的概念上。¹⁵而在探究

¹⁴ 參見拙作：《「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台北：秀威資訊科技公司，2007年12月）第二章第二節，頁29-47。

¹⁵ 相關論述可參考陳建華：《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開展 1927-1930》（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陳建華從盧卡奇的《歷史小說》切入，說明盧卡奇文藝思想理論的發展脈絡，並以「整體性」概念作為盧卡奇和茅盾共享的思想資源，論析茅盾二〇年代末期的文學特色和重要性，說明馬克思主義的「整體性」概念如何在中國獲得文學上的發展。而拙作《「社會整體性」觀念與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發生和形成》也從盧卡奇的「整體性」概念論述中國現代長篇小說的形成及其所關注的幾個面向。

丁玲小說創作的發展脈絡及其精神內涵時可以發現，丁玲的作品呼應時代思想主潮，同樣對民族國家的建立及其過程中所產生的現實問題具有高度的關注和參與，然而她的女性身分、鮮明的個性和對時代感覺異常敏銳的特質，使她在參與社會革命的過程中不斷與現實產生種種矛盾和衝撞，也在思考和對話的過程中尋求個人與社會、集體的磨合之道。在此漫長的磨合過程中，尤能凸顯丁玲的時代感和時代意義。

因此，本論文在縱向與橫向的交叉對比中，論述將透過以下的章節安排來展開。

第二章〈出走的娜拉：廬隱、馮沅君、丁玲作品中的情感書寫、啟蒙困境及其對女性處境的思考進程〉中將丁玲放在五四啟蒙運動的脈絡中，透過丁玲與五四女性作家前輩廬隱、馮沅君對於愛情、親情、友情、婚姻、家庭等問題的態度之比較，凸顯二〇年代末期登上文壇的丁玲對五四女性情感書寫的繼承與超越，並由此展現女性作家對於女性處境問題的思考進程。三位作家的共同之處在於她們都透過個人的具體經驗呈現「啟蒙」後所延伸出來的「女性」問題，而從這些問題又可以發現五四啟蒙內涵的匱缺之處：「啟蒙」思想雖然解放了個人，卻並未指出解放之後的人生道路，也不保證必然能找到真正的人生道路。廬隱、馮沅君等五四女作家偏重在描述「正在出走的娜拉」的心情，廬隱筆下的女主人公既反抗傳統家庭的束縛，又不願進入平凡瑣碎的新式婚姻生活，在新、舊時代的女性困境的夾擊之下，只能透過懷想學生時代的同性情誼來寄託悲哀絕望的精神；馮沅君則在與家庭決裂的五四時代企圖尋求親情與愛情的和解之道。相較之下，作為後輩的丁玲更偏重在

「出走以後的娜拉」的心情，她筆下的女主人公不再是家庭中的「女兒」，而是社會中的「個人」，她在思考女性人生出路的過程中建立女性的主體感覺。

第三章〈從啟蒙走向革命：論二〇年代至三〇年代初期胡也頻與丁玲的小說創作〉中企圖通過丁玲及其文學伴侶胡也頻兩人小說作品的比較，說明性別差異對文學創作主題的選擇及其表述方式可能產生的影響。兩人如何從五四啟蒙精神走向革命的道路？愛情與革命在兩人筆下將以何種關係呈現？而其呈現方法又與他們看待革命的態度有何關係？同時，也透過對丁玲小說的分析，說明「女性」、「啟蒙」與「革命」三者在此時呈現何種關係？整體來說，胡也頻與丁玲從二〇年代到三〇年代初期的文學創作完全貼合中國現代文學史從啟蒙走向革命的歷史道路。兩人早期的小說作品都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人的發現」的思想所影響，但兩人的關注焦點並不相同。胡也頻早年貧窮漂泊的歲月使他二〇年代的作品向廣大的社會底層展開，既從書寫下層群眾的生活苦境出發，進而思考與批判各種社會問題；又從反封建的啟蒙思想出發，進而反省麻木冷漠的國民性，其作品繼承五四「文學研究會」的文學傳統，在小說中展現知識分子的社會關懷和人道主義精神。丁玲走上寫作之路的某部分原因來自於文學伴侶胡也頻的影響，但丁玲卻從女性經驗出發開展出與胡也頻完全不同的創作題材，丁玲以女性生命出路的思考為起點，一方面強調女性「工作」的重要性，這是女性參與社會的方法；另一方面也從現代化與資本主義商品化的社會環境說明女性被觀看和物化的生存困境，這是女性參與社會時必須警覺的引誘和陷阱。同時，丁玲也坦率地呈現女性在面對以男性為主體的社

會時，不知將置身何處的孤獨徬徨之感，因此相較之下，丁玲更接近五四「創造社」的文學傳統，透過書寫、剖析自我，呈現新式女性知識分子的生存困境。1928年胡也頻和丁玲來到上海後，受到革命文學風潮的影響，兩人的思想開始左傾。在關於革命與戀愛主題的小說中，胡也頻透過青年男女共赴革命之路描寫革命與戀愛的相輔相成；相較之下，因寫作而得以獨立自主並參與社會的丁玲，在面對革命時卻充滿疑慮，對她來說，五四所強調的個人解放與社會革命所強調的集體性和政治性，在思想上具有本質性的差異，因此在啟蒙與革命的交叉路口，她佇立思考。

第四章〈「亭子間」與「十字街頭」：蔣光慈、丁玲「革命＋戀愛」小說之比較〉中透過對蔣光慈、丁玲二〇年代末期「革命＋戀愛」小說的比較，說明在性別、學養和思想背景等方面都不同的蔣光慈與丁玲在此一主題上的差異。而在「革命＋戀愛」小說中最具有象徵意義的「空間」是「亭子間」和「十字街頭」，透過對蔣光慈、丁玲小說的分析，說明兩人如何展現革命與戀愛、革命與文學、個人與集體以及公（十字街頭）、私（亭子間）領域之間理想與欲望相互交融的狀態。作為男性作家與共產黨員的蔣光慈早年留學蘇聯，回國之後在國、共分裂的革命中挫之際與後期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共同引發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同時也是「革命＋戀愛」小說寫作形態的開創者。儘管他具有鮮明的革命意識形態，但他最強調的卻是革命激情，而非革命具體的思想或行動，因此他的文學創作在本質上是繼承五四浪漫主義的精神，以「革命」取代「愛情」成為生命激情的出口，同時也是表現自我的方法。他高唱革命的重要性，卻始終鍾情於文學。相較之下，作為女性作家和非